



■ 赖某深 曾德明

葬礼外交是一种特殊的外交形式，指国家或政府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死亡事件举行葬礼而引发和促成的一系列外交互动。晚清中国的首次“葬礼外交”随着王之春《使俄草》的出版（收入《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2016年12月版）揭开了这一鲜为人知的历史一幕。

王之春（1842~1906），湖南清泉（今衡南县泉溪乡坪坪），为明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的七世孙。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先后任李鸿章、彭玉麟之部属，率军驻防北塘海口及江苏镇江。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之后，他受两江总督沈葆楨派遣赴东瀛探访日情，于1879年在日本游探近一月，以所见所感书为《谈瀛录》。1879年，王之春根据清代顺治至同治年间中外交涉的有关材料辑录成《清朝柔远记》一书，以为谈时务者之资。1891年，他署理广东布政使期间，曾代生病的广东巡抚刘瑞芬接待来华旅行的俄国世子尼古拉二世。因以上经历，他在光绪二十年（1894）以头品顶戴、湖北布政使的身份，作为唁贺专使被派往使俄，一面吊唁沙皇亚历山大三世逝世，一面庆贺尼古拉二世加冕。《使俄草》即记此行经历，

起自光绪二十年十月十六日奉旨派充专使赴俄，终于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十七日因枪伤奉旨赏假一月。

日记的内容大体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卷一至卷四，从光绪二十年十月十六日至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启程离开俄国，记作为唁、贺专使赴俄经历。

此时正是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王之春此行负有特殊使命。这从行前光绪帝召见王之春的回答中可看出端倪。光绪帝于十月十八日召见王之春时说：“甲申（1885）年间，朝鲜巨文一岛，英人曾泊兵船于其地。俄人恐其占据，屡来问讯，嗣诘英人，英人以恐为俄占覆。俄遂与中国定约，日后俄人断不占夺朝鲜地土。今倭人乃无故召衅，占据朝鲜全境，俄人岂得视若无睹？”利用俄、日矛盾，寄希望于俄国对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占据朝鲜全境”施加压力，这正是此行目的所在。

巨文岛事件的解决是晚清政府利用外交斡旋手段处理大国矛盾的成功特例。巨文岛地处朝鲜半岛南部海域，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1885年4月，英军占领巨文岛，后在俄、中、日各方压力下，最终以俄国不侵占朝鲜领土和英军撤出巨文岛为结束。王之春从总理衙门查阅巨文岛一案，及“与英俄往还各卷，逐一翻阅所有要件”，对完成出使使

命信心十足。

十一月初一日，王之春出都。五日到天津，晋谒李鸿章，咨询朝鲜巨文岛事甚详。六日闻金州、旅顺相继失守。

十二月初十日从上海坐船启程，经香港、新加坡、印度洋，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初二到达亚丁，接到驻俄公使许景澄一函，“云西例，凡特使皆以头等公使相待。平素入国境，必以护照为凭。特使则由俄主飭边境官照料，至国都，即备大客店为宾馆，亦西例也。西例，客店靡丽逾于王宫。”二十一日，到达俄国边境，俄派官员迎候。次日到达圣彼得堡。二十四日即获尼古拉二世接见。

尼古拉二世说：“我见贵大臣甚为欢悦，前在广东游历，曾蒙接土。今倭人乃无故召衅，占据朝鲜全境，俄人岂得视若无睹？”利用俄、日矛盾，寄希望于俄国对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占据朝鲜全境”施加压力，这正是此行目的所在。

王之春答道：“是。中日战事，昨蒙大皇帝劝解，敝国深感感谢，尚恳大皇帝主持劝解，俾两国仍臻和好。”

尼古拉二世表示：“凡事以和为贵，贵国与敝国邦交二百余年，又承远来，自无不竭力相助之理。烦代为致意贵国大皇帝。”

二月初八日，王之春一行与驻俄公使许景澄同赴俄皇陵寝致敬花圈，吊唁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余率参赞至堧前行三鞠躬

礼，其礼官则屈一足于椁右，以手指画心作十字势，礼毕退出”。花圈是“雕银花圈，大可三人合抱。费卢布二千余金”。

王之春此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葬礼外交”——通过派出“专使”悼念俄皇进行外交活动。作者对于自己的使命有清醒的认识，在书前的《凡例》中三次提到“专使”，并说“专使唁、贺，系属创举”，前所未有。俄国对此也不可谓不重视，派出专人到边境迎接，安排乘坐御用火车，给王之春颁赠“头等宝星”，派画家给王之春一行画像——这都是驻俄使节从未享受的殊荣。但是外交使命，却被尼古拉二世“凡事以和为贵，贵国与敝国邦交二百余年，又承远来，自无不竭力相助之理。烦代为致意贵国大皇帝”轻飘飘的一句话就打发了。

第二部分为卷五至卷七，起自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至德、俄交界，止于四月二十九日派人赴马赛买船票准备回国。主要记在英、法的外交活动。为何在完成赴俄使命后还在英、法耽延二个多月之久，是因他积极开展秘密外交活动，试图挽救甲午战争的败局。为此他一方面与驻英参赞宋育仁密切联系，另一方面试图再次聘请英国军官、前北洋水师提督琅威理来

中国。此方案得到南洋大臣张之洞的支持，但因遭到驻英公使龚照瑗与李鸿章等主和派的反对而流产。

这部分最有价值的记载是对甲午战败的分析。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二节录了法国《覃排报》论中日战事一则，说日本“整军经武”，中国则“漠然不动”，“墨守旧章”，“不知远虑，武备阙如，遂于目前战事铸成大错”，“故中国守旧之意一日不破，即一日不强，四十年来已受多少欺侮，而竟全未领会，殆以为人民繁盛，心中一动念而可压敌人，一举指而可掩敌人欤？夫论民数之多，中国洵足集兵无数，而军皆乌合，不任辛劳，不知悍御，盖缘其国上下下皆不以武事关怀故也”。作者认为“以上所论，虽未必悉是，然中国止知守旧，不修武备，实为切中肯綮，故为删润存之”。

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八日的日记，作者慨叹我国海军无人材：“越南之役（指1884年的中法战争），上下皆知非创立海军不足以出奇制胜，十年来，添置巨舰，建设船坞，只以运用无人，不能争雄于海上，徒使拘守门户，坐困穷岛。方伯谦既败于前，刘步蟾复失算于后，事机之失，噬脐已晚。是非船炮之不利于倭人，实则管带、驾驶之无人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思

了甲午战败的原因。

四月十六日记载，前日法国报纸报道，在中日和局未定时，法国司令带斯、反克斯、西扇尔、须扇四艘军舰“装足三个月煤粮，准备起程前赴东方，勒令日本不得侵占中国地面，嗣闻中国已经画押，又有倭人至法阴阻之者，遂令暂缓起行”，不禁浩然长叹。

第三部分为卷八，起于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一，止于闰五月十七日，记从巴黎回国途中见闻。最值得注意的是刺杀案。作者五月初三从马赛坐船，有三个日本人同行二十一天，二十五日至锡兰后这三个日本人改乘德国轮船先行。闰五月初八日作者到西贡上岸游玩时，“昏黑关怀故也”。作者认为“以上所论，虽未必悉是，然中国止知守旧，不修武备，实为切中肯綮，故为删润存之”。

王之春此行，留下不少谜团，到底他与“三国干涉还辽”有何关系，西贡被打黑枪是否日本刺客所为，也许只有广泛查询中外档案及当时的报章报道，才能揭开谜底。

由《看云集》品周作人散文之魅

■ 朱航满

周作人的散文集《看云集》1932年10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收文40篇，多作于1930年和1931年。六十年后，开明出版社再版了《看云集》，收录在该社策划的“开明文库”第一辑之中，同时第二辑的“开明文库”中还再版了《周作人散文钞》。后者系周作人的一部散文选集，由开明书店的创办人章锡琛编选，并为之作序。开明书店一家服务于青年人的书店，显然章锡琛对于周作人的散文甚为偏爱，在他为这册《周作人散文钞》所作的序言中，开篇就有这样一段话：“这部选本用意是给中学生一个榜样，让他们明白怎样才能将文章写得好。周岂明先生散文的美妙是有目共赏的；他那枝笔宛转曲折，什么意思都能表达出，而又一点儿不罗嗦不呆板，字字句句恰到好处。最难得的是他那种闲逸的情趣，却却不是人人可学的。”

章锡琛在序言中还赞叹周作人的文章“都有他自己的气分”，即使读者“暗中摸索”，也能辨别得出。这说明周作人的散文在当时已经独具魅力，但章锡琛笔锋一转，在序言结尾写道：“最重要的是对于礼教的攻击，还有他的文艺的意见以及哲理诗情，这儿都有了。徐志摩先生说他是个剥削的人；他随手引证，左右逢源；但见解意境都是他自己的，和他的文章一样。”由此可见，周作人在时人眼中，既是一位散文家，更为关键的身份是一位很有见识的思想者。《周作人散文钞》的选目出自周作人的各个散文集之中，总共三十篇文章，其中从《看云集》之中选了六篇文章，分别为《哑吧礼赞》《伟大的捕风》《水里的东西》《希腊的古歌》《草木虫鱼小引》《枣》和《桥》的序》。以上几篇文章，基本都是周作人的散文代表作。

周作人在《看云集》序言中写道，这本书的题目来自于王维的一首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表达了作者的一种“闲适”态度，编选《周作人散文钞》的章锡琛不但看到了周作人的文章之美，更看到了其思想见识的非凡。周作人对于自己的散文有很清醒的认识，他似乎并不随意写一篇文章，但其中的用意却往往在隐藏很深，表达方式也是比较曲折的。周作人后来在五十寿诞时曾写过一组打油诗，在上海的鲁迅给朋友曹聚仁的回信中评价说，“周作人自首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实为今之青年所不嫌，群公相合，则多近肉麻，于是火上加油，遂成众矢之的。”

《三礼赞》系列可看作周作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具体有《娼女礼

赞》《哑吧礼赞》《麻醉礼赞》，是他的反讽之作。在《哑吧礼赞》中，周作人先是赞扬哑巴的诸多好处，走笔至结尾处，转而议论道：“世道衰微，人心不古，现今哑巴也居然装手势说起话来。不过这在黑暗中还不是不能说话，不能说话。孔子曰，‘邦无道，危行言逊。’哑巴其犹行古之道也欤。”再如《麻醉礼赞》，他对于麻醉虽是一种文明，但中国人的麻醉方法却不外乎吸鸦片和饮酒，在“醉生梦死”的社会之中，“所苦者我只会喝几口酒，而又不能麻醉，还是清醒地都看见听见，又无力高声大喊，此乃是凡人之悲哀，实为无可如何者耳。”

《草木虫鱼》系列可看作周作人的另一种表达。在《草木虫鱼小引》中，他这样写自己做这样的文章的因由：“第一，这是我所喜欢，第二，他们是生物，与我们很有关系，但又到底是异类，由得我们说话。万一讲草木虫鱼还有不幸的时候，那么这也不是没有办法，我们可以讲天气罢。”在《金鱼》一文中，周作人借金鱼来谈自己对于封建礼教的厌恶，认为金鱼突出的眼睛，令自己想到脖子上挂着一个大瘤或驼背，乃是一种对于残废的变态欣赏，进而令自己想到国人对于小脚女人的偏爱。周作人的这种联想和批评，是冒险的，这也可见他对于礼教的厌恶是何等深厚。

周作人的文章有一种苦涩的滋味，这种苦涩，一方面是作者曲折隐晦与枯淡文体的追求，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作者对于现实的苦恼和无可奈何。但毕竟经历过五四洗礼，他的文章也常常体现着一种科学与理性的态度。《伟大的捕风》一文中，他先是由谈鬼说怪而起，娓娓道来，并最终认为这都只不过是说鬼者的一种心理投射，此类观点他在之后的文章中也多有提及，但关键的则是他要表达自己的一种科学的认识世界的态度，“虚空空由他虚空，知道他是虚空，而又偏去追逐，去黎明，那么这是很有意义的，这实在可以当得起说是伟大的捕风。”这里周作人所说的“虚空”，其实不外乎是虚无和荒谬的事情，而周作人认为对于这些事情的察明，意义更为关键。这就可以说是一种非常科学且务实的事情了。在这本书中，还有多篇类似的观点，诸如《水里的东西》《拥护达生编等》《介绍政治工作》等文章，表达的都是这个意思。

当然，作为杰出的散文家，周作人在《看云集》中的文章非常漂亮，尤其是《三礼赞》系列和《草木虫鱼》系列，可以说是写得几无挑剔。整整三十年后，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阅《看云集》，觉所为杂文虽尚有做



《看云集》初版封面

作，却亦颇佳，垂老自夸，亦可笑也。”这种感慨，不但有一种对其散文写作的回望和总结，也有对一个文学时代的怀念。他曾在《冰雪小品序》中谈到，“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它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进而又说：“小品文则在个人的文学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它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所以是近代文学的一个潮头。”在他看来，乃是在颓废的时代，皇帝祖师等要人没有多大力量了，处士横议，百家争鸣，正统家大叹其人心不古，可是我们觉得有许多新思想好文章都在这个时代发生，这自然是因为我们是诗言志派的。学者倪墨炎在专著《隐士与叛徒》中，认为《看云集》中的随笔散文，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之所以倪墨炎有这样的评判，在他看来，周作人《看云集》中的文章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三礼赞》和《伟大的捕风》等为代表，以为这些文章都是政论的主题，但却以随笔散文的方式很好完成了。“它们没有任何政论的架势，像其他随笔一样，如同促膝谈心，娓娓道来，引证左右逢源，十分自然；和其他随笔不同的是，它们内容磅礴，知识丰富，主题重大，蕴含深刻。”这一散文的创作，在倪墨炎看来，则是周作人散文写作的一个重大开拓，也是他的散文艺术中的重大成就。另一类则是以《草木虫鱼》和《专斋随笔》为代表文艺杂谈，特别是《草木虫鱼》这一组文章，“谈金鱼，谈虱子，谈白杨和乌柏，谈水族，谈蝙蝠，真到了玲珑剔透的地步，称得上雍容、漂亮、缜密。”倪墨炎先生的这段评价非常恰切。由此想到章锡琛在《周作人散文钞》的序言中的评价，以为既有一种艺术上的“他自己的气分”，也有思想上他自己的“见解意境”，可以说，对于周氏散文的评价，虽历经多个多世纪，还是有着一脉深处的共鸣。

茅盾四封书信考

■ 金传胜

1949年2月，上海万象书影印出版了一本《作家书简》，以中央书店的名义发行，编者署平衡，即现代作家、出版家平襟亚。该书共收入70余位现代作家的书信手迹，其中收有茅盾两封，但抹去了受信人抬头称呼和几处人名、刊名。新旧两版《茅盾全集》依据手稿，均以《致陶亢德》为题辑入。

2014年，南京拍卖市场上出现了茅盾致宇宙风社、陶亢德信札四通，以及茅盾手稿《我的小学时代——自传一章》。拍品据说来自陶亢德家属，且信稿上还留有《作家书简》出版时的编辑痕迹，铅笔圈注的地方正是出版后“失踪”的文字。由此，上述两封书信终于恢复了全貌，而新出现的两通书信作为新史料，亦颇具文献价值。现据书信手迹，释读如下：

第一通
宇宙风社：
来信读悉。蒙征长篇，未能应命，因虽有写个长篇之意，实尚未有一字也，而此三个月内预计亦无静坐写长篇之可能。四十九期近在目前，天然如此，实亦不能执笔，与其卖空，不如老实些。至请原谅。专复即颂
撰祺
茅盾 十二日

第二通
宇宙风社：
十四日来信也收到了。预约就是欧化的卖空，还是不预为妥。自传一章，仍因天然不能工作，下月内也怕不行。专此奉复，即颂
撰祺
雁冰 廿日

第三通
亢德先生：
手示奉悉。《宇宙风》征自传一章，当勉力效劳。本思奉访，快聆雅教，惟弟为《文阵》发稿待排，明日即须赴广州料理，只得俟归来后再谋识荆了。
顷又接筒又文先生招赴思蒙大酒店茶酌之约，亦因明日即赴广州，不克赴召，想来先生必可体谅又文先生，乞为转白，不胜感荷。勿复烦颂
撰祺
沈雁冰 廿三夜

长篇则因业已有《你往哪里跑》在手，尚未脱稿，一时无力再谋其二，恕不能应命。又及

第四通
亢德先生：
大札读悉。日前曾因应付不开，对于各副刊约稿，一律谢绝。现在您是周刊，倘再援例，则若弟有成见。惟弟仍拟先如贵周刊之性质，能见告否？月底或下月初交稿，亦觉匆促，盖弟杂务颇多。反正是双十创刊，又是周报，何必讨债如此之速？余容后详。即颂
撰祺
沈雁冰 八月廿五日

其中第一通、第三通已经见于《现代作家书简》，第二通、第四通为集外佚信。《茅盾全集》收入第一通时将其时间判为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一日”，似可商榷，下文将予以补正。将第三通的时间确定为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较为妥帖。由于全集出版时原信尚未“现身”，故此信中“《宇宙风》”“简又文”“又文”等被平襟亚略去的文字只能付诸阙如。

观第一、二通书信内容，因都有抱怨天热的说辞，可知它们的写作时间靠近，大约写于夏季或初秋。第一通书信中明确提到“四十九期近在目前”，说明茅盾写信时，《宇宙风》第四十九期即将出版。查《宇宙风》该期的出刊时间，为1937年10月16日。那么第一通书信便可确定为作于1937年10月12日。

据第二通不难推想，收到12日茅盾的回信后，宇宙风社编者（点即陶亢德）于14日再次投书茅盾，向其预约文稿。在14日的书信中，考虑到茅盾无暇创作长篇，陶亢德很可能约他撰写“自传一章”。对于这一约稿，茅盾表示“仍因天然不能工作”，近期无法交稿。故第二通书信当作于1937年10月20日。至于已到10月仍天气炎热，不免有点反常。陶亢德所约的“自传一章”，最终即茅盾发表于《宇宙风》1938年5月30日第68期的《我的小学时代——自传一章》。可见茅盾最终还是交了差，虽然已经是半年之后。

从内容来看，第四通也是一封约稿信。陶亢德拟于当年双十节创办一个周刊，因此向茅盾约稿。那么，陶亢德准备筹办的是什么样的刊物呢？郁达夫1939年于《星洲日报半月刊》连载的《回忆鲁迅》在文前说明中有如下一段：“去年自武汉疏散出来，避难在洞庭湖南岸的汉寿，一住就住上了三个月。在汉寿，没有书看，也没有事情做；忽而接到香港的陶亢德的信，说《星岛周刊》，将次发行，无论如何，要为他写一点东西。”郁达夫避难汉寿的时间约在1938年7月11日至9月22日，《回忆鲁迅》一文则始作于8月14日。因此，郁达夫收到陶亢德的约稿信，应是在7月下旬至8月中旬间。根据上文提供的线索，我们知道陶亢德曾在香港印行《星岛周刊》，时间在1938年8月后。有关资料显示，《星岛周刊》仅出版一期，但笔者未查到具体的创刊时间，或许就是在双十节。创刊号载有郁达夫《回忆鲁迅》的开头一部分，是否还登有茅盾的文章，尚待考证。陶亢德在编辑《论语》《人间世》《宇宙风》时期，已与郁达夫、茅盾等著名文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在筹备《星岛周刊》的过程中，他继续向这些老朋友们拉稿，自然是合情合理的。由此笔者认为第四通信当作于1938年8月25日。这一日期与陶亢德向郁达夫约稿的时间节点相近。可惜的是，陶亢德致郁氏的信函迄今未见，不知道将来是否也有“出土”的一天？